

主题文章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宣教



罗天乐 牧师
(三藩市小区学院音乐系教授)

前言

蒙 神厚恩，笔者从 1972 年起任教于加州三藩市社区学院音乐系^[1]，教授独唱、合唱、乐理、键盘及东亚音乐课程外，并从事发展“民族音乐学”课程，成为在北美社区学院讲授民族音乐课程的前驱老师。笔者希望在此分享点滴心得，俾能对华人教会及宣教事工作出一点提醒及贡献。

民族音乐

民族音乐学前身是“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最早出现于 18 世纪。“民族音乐”这概念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后来发展成为“音乐学”(Musicology)的三大分支之一：

- “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
- “系统音乐学”(Systematic Musicology)
- “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

“民族音乐学”一名从 1950 年由荷兰人昆斯特〈Jaap Kunst, 1867-1960〉提出后，数年间迅速成为西方学界所接受。可惜在基督教界，尤其是华人教会对此发展并不感兴趣。中国教会音乐仍然停留在承受西方音乐传统的阶段。笔者从 2002 年起，每年在加

州湾区举办一两世界民族音乐会，每次来宾多且反应甚佳。华人虽占湾区人口百分之三十五，不过来宾当中却多属欧美白人；由此可见华人民族主义意识仍很高，此现象有碍于华人从事跨文化宣教的使命。

研究世界民族音乐学就是研究西欧“古典音乐”^[2]和现代“流行音乐”^[3]以外的音乐。民族音乐并非没有发展空间，其实它的历史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并肩齐进、乃人性的自然产品。民族音乐从远古到现在仍然是普及的音乐，因为民族音乐是基于实用主义，产生自人们内心灵感情绪的催促，用语言诗词来表达，用歌唱乐器演奏伴奏，甚至用舞蹈来抒发内心的感受^[4]。民族音乐虽没有像古典音乐般^[5]，与人文主义的思想哲理和理性主义(Humanistic Philosophy & Rationalism)同步发展，直到现在民族音乐仍然很普遍，亦是音乐家热门主题之一。

古典音乐

古典艺术音乐及从它发展出来的流行及商品音乐都有其价值，但对研究人类历史中的基本人性、文化特色、文化发展等主题，却不及世界民族音乐的价值高。

古典音乐是西欧文艺复兴时期^[6]到 18 世纪启蒙时代^[7]人文主义^[8]的理性产品。这时期人文主义兴盛，教会音乐世俗化，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科技，古典音乐，艺术发展奇速……此形而下^[9]唯物的理性发展虽美好，但对宗教信仰产生了有意无意的对峙情况。巴哈^[10]的“十二平均律”^[11]的探讨，将纯八度^[12]平均分成十二个半音，推动当时的音乐发展的速度，从此多产音乐家层出不穷，巴哈被后世音乐家称为古典音乐之父。

可惜西洋古典音乐到了“浪漫主义”^[13]时期，歌词的内容不被提倡。德国浪漫主义理论大师花瑾镛德 (W. H. Wackenroder) 宣称，语言为身外之物，音乐较为亲切：“人心深处，情思如海浪澎湃，变动不定。以语言来表达、书写，只不过是寄寓于外物异体；音乐则动于中而流于外，是自发性的，不需要别人的理解。”^[14]从此西方古典音乐便走向以音乐情操为中心，歌词内容，理性道德都被赶出门外了。无怪乎很多时听完美妙的歌曲之后，会感到余音“绕梁三日”^[15]，但往往把歌词忘得一干二净。

为什么要从民族音乐角度看宣教？

宣教是福音的传播，是教会实践大使命的先驱。宣教做得对，其发展出来的教会问题也相继减少。宣教要做得好，我们必需对宣教对象〈受众〉的文化，历史背景，哲学，社会行为及宗教信仰有深入的认识，才能对症下药地设计宣教策略，以致可以有效地让受众接纳福音，达致宣教的目的。透过民族音乐宣教人员可以洞悉宣教对象群体的民族文化特征。

音乐是人类独有并且需要美化的共通语言。著名的人类学家玛嘉烈美德〈Margaret Mead〉曾说：“音乐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毋怪乎基督教是一个充满音乐的信仰，从民族音乐我们可以明白一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因此用音乐宣教是有效的策略。

民族音乐学对宣教的贡献

民族音乐学的知识及经验对宣教和教会建立都有不可缺少的贡献，因为世界上各民族都有其音乐表达的形式与结构，我们可以藉着对音乐不同的表现方式，来深入了解不同文化及社会的背景和内涵，包括音乐与奏乐者或歌唱者在社会上的角色与价值、人们如何透过音乐定位自己的存在与认同、以及藉着音乐，人们如何与不可知的宇宙神灵沟通……等。透过研究这些音乐丰富的质素，我们可获得对各民族的音乐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与体会。认识诸多人类共享的音乐遗产，我们可以更睿智地理解人类多样的生活方式，进而对自己与他人的生存状态有更深刻的反省及认同。

民族音乐学在“知性”(Cognitive Perception)上兼有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及西方音乐学(Western Musicology)的认识。例如应用于台湾的“田野调查”(Field of Study)，我们必须分辨台湾族群间(汉族、原住民……等)的音乐传统与其音乐田野状况(Field Condition)；在“感性”(体验上的)上，民族音乐学是研究各种类型的音乐，如何做为社会文化的一个层面，而能斡旋(Mediate)人群之间的互动(Interaction)。因此民族音乐学的领域结合了美学(Aesthetics)、音乐学(Musicology)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如此借重社会文化的生活处境(Context)和观点来看当下多样人类社会群体(Folk groups)^[16]的音乐^[17]，一方面分析音乐本身的形式(Form or Style)与结构(Structure)；另一方面则将音乐视为一种表现文化的方式，我们便可反思此一媒介如何能穿透或阻隔人类社会群体间的认同边界(Identification border)，因而具有影响当时历史与社会的能力。

这研究可以装备我们作个有果效的宣教士，使我们能超越教会里古典与流行音乐爱好者之间的争执，这争执是由于对音乐整体的肤浅认识和经验所带来的。宣教策略必须能穿透人群认同边界才能成功。这当然也是教会音乐事工的成功策略，尤其是中国教会，因为北美中国教会里具有多种并复杂的群体及次群体，每一个群体都拥有不同的特征。不但如此，民族音乐的研究，包括现代音乐里面的传统民族音乐内容，可让我们了解欧美“先进”国家的古典艺术及流行音乐怎样在近百多年内藉宣教、外交、旅运、物资、文化、传媒、资讯的交流管道，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世界各地的本土民族音乐(Indigenous Music)，因而更有效地设计宣教策略。

例如当我们拥有能穿透人群认同边界的装备，再加上有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就能容许、不干预、承认或尊重他人的音乐语言的脉络，穿透这不同的音乐语言来看他们歌词里所要表达的意念甚至信念。民族音乐学加上实用神学的知识经验，不单能在两者之间协助解决此冲突，并可在此负面力量导向彼此合作的正面力量。正如我们因爱在牙牙学语的婴儿，能穿透他的不清楚字句，明白他所想说的话一样，又能引导小孩快速学语。

其实北美华人教会群体或次群体中很多嗜好传统音乐如粤剧、国乐的人，他们都要被迫无可奈何地学习怎样容许、不干预、承认，尊重我们时下的半西不中的教会音乐表现形式。就如保罗所说“向软弱的人，我就作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林前九 22)

可惜在华人基督徒中研究民族音乐的人极少，其他的音乐家只懂古典或流行音乐，而基督教宣教士又往往把欧美圣诗短歌直接使用在宣教工场上。这种做法等于是强

求受众首先欧美化^[18]然后才可以接受福音，创立的教会自然是强烈的西化，文化侵略(Cultural Invasion)的后果遮盖了福音大能。

再者华人基督徒音乐家中极少人有民族音乐或文化人类学的装备，而且极少人对神学和敬拜神学有深入的认识和心得，因此教会音乐的问题鲜有解决的方法。教会牧者长执甚至神学院也忽略对这问题的研究和知识。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缺乏市场需求^[19]，或是没有研究资源及知识经验去作教导的事工。要协助解决这等问题，我们需要教牧的领导，教导和主持，敬拜领导者的教牧呼召，合作顺服，音乐的知识 and 经验，再加上教会整体的支持。因为音乐是敬拜事工，敬拜又是教牧事工。^[20]

如何把中国音乐特色的知识装备应用在宣教事工上

为了对中国教会及普世华人宣教和音乐事工有帮助，我们应对中国音乐的特色有一点认识。然后与圣经的音乐原则作一比较，使用在宣教事工策略上。

中国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的先锋，凡研究音乐发展史或世界民族音乐的人都要首先研究中国音乐，因为中国音乐远在文艺复兴期之前三千多年，直到现在仍然是世界最早及最先进的民族音乐。远在英伦群岛还只有泥屋沼泽的时期，中国宫廷乐团已有上千的团员。中国音乐的特点是其道家的自然，而儒家的礼和治学方式，及佛家的哲理。

一、中国语言与音乐的密切关系

《诗》曰：“言之不足，歌之，歌之不足，手舞之，足蹈之”。《毛诗序》里有这样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当我们的语言不能表达心情时，会唱歌；当高歌还不足以表达自己情感时，会手舞足蹈。人由“情动”至“足蹈”，行为体验着至情至性。可见舞蹈是人们言歌不足时表达生命本质的一种最基本最直接的本能，是人们最能够自由而欢畅淋漓地表达内心“情动”的形式。它是自由的艺术，是舞蹈者内心情感的自觉或自由的表达，是心灵的外化。

虽然如此，中国人对诗词与音乐的一致性非常重视。汪士铎《汪梅村先生集》卷五《记声词》之二：“诗自为诗，词也；声自为声，歌之调也，非诗也，调之淫哀，虽庄雅无益也。”“庄雅”的歌词若配上“淫哀”的调子，是没有益处的。

小结：

中国的音乐出于语言，诗词，所以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中国诗词，甚至文章都是唱颂出来的，充满旋律节奏。我们写作时常用平仄和平上去入等音乐原则来衡量语法的通顺程度，然后用朗诵吟唱方式去决定所写的文字是否有声调节拍的美感。

良好的宣教或教会音乐必须注重歌词内容，歌词最好用受众的母语写成，用歌词的音乐内容旋律节拍^[21]来谱曲，不能先谱曲然后填词，否则音乐的感情变成重要，而歌词的意义减少了。《礼记·乐记》中说：“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如圣经所说，用灵与悟性歌唱敬拜：“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林前十四 15）

这里说明歌曲里的灵与悟性必须一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弗五 19）这里说明诗章、颂词必需领先然后以编曲美化之。“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林前十四 19）这里说明悟性说话比万句方言更重要。纯音乐或伴奏音乐是非悟性的美化语言，是内心感情的外化，没有歌词，甚至与歌词一致的音乐，因为“听者有耳”，言外之音可一可二，不能肯定，听了之后，先入为主，不能擅改。中国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再加上中国言语诗词已配备了调子节奏的内容^[22]，因此朗诵诗词就如唱歌，比谱用半西不中的调子来唱好得多。例如广洲话的歌曲一定要用广洲话的音韵来谱曲，否则唱出来会啼笑皆非，“爱主”会唱成“爱猪”。宣教的语言及交流媒介或教会的音乐实在应给人有能作文化认同的感受。

二、中国音乐的道德观

古人把音乐所含的道德因素分成两类：雅乐和淫乐，其中各自以《韶》与“郑声”为代表。

雅乐：

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也”。也就是说，好的音乐能提升人的道德标准。孔子称赞韶乐是“尽美矣，又尽善也”，以致闻之“三月不知肉味”。

淫乐：

《论语》中还特别强调要“放郑声，远佞人”，因为“郑声淫，佞人殆”。当时郑、宋、卫、齐四国均有淫声：“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因此人们在选择礼乐来提升自我修养时，首先要能识别什么是雅乐什么是淫声。

小结：

基督教音乐应是能使会众产生文化认同感受的音乐；能尊重他人音乐语言的脉络，能穿透不同的音乐语言，能给人在他们本土音乐语言的脉络上感受到的音乐，这样会众才容易明白和接纳。不但如此，我们的音乐必须对人有优良的影响力，引人归向基督。

雅乐能给人感受到高雅，道德的深刻印象，不如淫乐，给人“好滥淫志”的印象，“是以祭祀弗用也。”现代流行音乐给人的印象多是“以极口腹耳目之欲”^[23]为主，会给人有不高雅，不道德的印象，容易被人批评，没有基督徒的榜样，要小心选择，多不宜敬拜之用。使用流行音乐式的敬拜诗歌时要小心，不要效法崇拜歌星的人，颠狂地举手尖叫，这样的行为给人“好滥淫志”的印象，领唱，弹奏吉他，打鼓的要有保守的举止，乐器伴奏的形式节奏当与歌词一致，适可而止。保罗在内室可能颠狂为神，但在众人面前的行为举止总是谨守的。“我们若果颠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林

后五 13) 良好的宣教或教会音乐语言必须是优良，平和，雅观，美丽，实用，引人向善归向基督的音乐。言与诗歌配乐时要有“文词与音调之一致”；假若诗与乐性有差异，“诗之“言”可“矫”而乐之“声”难“矫”^[24]”。文词可改编，但声（音乐的效果）很难改变。因此我们常会忘掉歌词，音调却可“绕梁三日”。

因为诗词需要配乐才成为歌曲，我们发觉配用的乐器有时会引起别人的反感，这里我必要提出一个常被人误解的事实：配用的乐器本身是中性的，我们不能审订个别乐器的道德价值。有些教会领袖一看见某乐器时就反对奏乐者，讨厌地批评他们没道德，这是无知。编曲者如能创意诚恳地把曲调编成“文词与音调之一致”，我们诗词的属灵内容就能表现得透彻，而不为声调音乐所误导。

三、中国音乐的形式

儒家的音乐原则是“中、平、和、庶”^[25]，意指音乐应是平和普及，中平和是不走极端，庶是普及的意思，是“庶人”亦可有份参与享受的，不太专门，太专门则不能普及。音乐是不需像西洋古典音乐一般，用来表彰人文理想，乃是“天地人和”的自然表现。

小结：

我们传的是和平的福音，所以我们的音乐是“中、平、和、庶”的，是平和普及的，是能与会众文化认同的，太专门太复杂的音乐让会众跟不上，只可用作献唱用。笔者认为会众唱的诗歌曲调最好是容易上口，结构不能有超过两个主题(Motif or Theme)，并且音域要适中，节拍不复杂，如此会众就能与我们口唱心 and 了。

四、中国音乐的功用性^[26]

在西方，音乐既不从属于礼，更不从属于法，而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在西方的文化中，乐舞独立，诗画无关，文史哲各为独立的学术。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无所不惜手足”。可见孔子是十分重视音乐的，他把“乐”看作人们修身成仁和兴邦治国的根本。《乐记》所言：“乐至而无怨，礼至而不争。”“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也”。

《论语》里常见诗、礼、乐相提并论，而其中礼是立足点，又是中心环节，诗和乐都要以礼为评价标准，又需符合“执两用中”的原则，以行中庸之礼为旨。

周公制礼作乐是为着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和谐相处。他把言语文字诗词的音乐内容理想化并立为国法。因此周公的宫廷充满了歌舞，把人心安定下来然后办理国务。这是雅乐的目的。所以中国音乐是一门功用艺术，是领导阶层用来管治，善导，保护人民的渠道。

小结：

中国共产党控制一切艺术和艺术家，传媒和资讯，没有给人民自由而酣畅的表现机会。毛泽东下令把所有艺术和艺术家归为国有国营，全部都要用在共产党革命上。我们教会宣教一定不能用毛泽东的方法，因为上帝不强逼人信服祂，强迫我们上天堂。“因为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罗五 8）人是按上帝的形像而造的，此形像包括自由自主，是不能被强迫的。所以我们宣教的策略是劝人，引人归主，用得人如得鱼的方法，在他们的田野状况里，用他们的语言，文字，音乐，哲学，社会行为方式来媒介，领导他们归主。

笔者事奉的教会是位于北加州的白人教会，我们有两种不同型式的敬拜：一是传统式，另一种是现代式。两个敬拜都有人满之患。笔者常参加传统式敬拜，领导敬拜的教牧人员有热心，风度，爱心及丰富的经验。只可惜所拣的两首诗诗歌不甚如意。第一首是“高举十架”^[27]，第二首是“伟大的救主”^[28]。第一首会众不熟，因此在场会众跟不上，杀风景，应放在后，待会众暖声后用强而有力的歌声领唱。到第二首会众熟识，但领唱者不熟也没有准备好，却放弃高雅，价值数十万美金的管风琴不用，要用钢琴创意式自弹自唱，弹得不好之外，加上把简单的节拍 (simple triple meter, 3/4 time) 改为覆式

节拍 (compound triple, 9/8 time) ，弹得不清不白的，会众又跟不上，因此会众虽然非常热心跟着唱，也都气衰或放弃。赞美敬拜因此变得不雅、不美、不实用。奉献时的独唱者是专家，女高音声质美丽，又拣了高雅的古典歌曲，可惜歌词吐字不清，词与调不配合，是以音乐为主，歌词为副的古典艺术音乐。独唱者来一个响亮的美声高音，在坐小孩以为独唱者在骂他，放声大哭。笔者虽然欣赏歌声和调子，但听不到三个字，觉得遗憾。虽然会众报以不少掌声，笔者不知会众掌声是为歌声、歌者、还是为了感恩。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尽管我们诚恳事奉，却如果不能客观地体会受众的田野状况而改变方针，我们会失去事奉的果效，带领人归向自己多过归向神。这里也说明虽然条件可观，但不懂怎样领导和忽略适应受众的田野状况，也会不知不觉产生不如意的效果。

总结：

宣教或教会事奉应能穿透受众的认同边界，以受众的生活脉络，观点和田野状况为中心，交流以悟性内容为主，事奉的目的（功用）是领导受众从内心自由选择与神和人和好，所用的音乐需文词与音调一致；用平，和，雅（不淫），庶的原则来彼此交流。

今天的教会，宣教仍是荒野一片，北美华人教会虽然活在夸越文化的环境之下，却对第二、三代华人的福音传播还是束手无策。华人教会仍然落在民族主义深重，还不能跨越文化语言的领导层手中。华人差传绝大部份集中在海外华人聚居地，要改革的地方很多。让我们继续努力，在上帝的启示之下，改变我们民族中心的心态，能在容许、不干预、承认、尊重他人的态度上，穿越不同的文化语言来进行对话，讨论如何改革，制订我们华人教会和宣教的策略。愿我们能在这属于中国的 21 世纪里，因改革传福音的策略，而能训练，差派跨越文化传福音的使者，把福音传到地极。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十九期，2010 年 1 月。

（笔者为特约作者特为本期撰稿；作者保留版权）

[1] 加州三藩市社区学院是全美最大社区学院，有十三校舍，十一万学生；至今该校共有五位民族音乐教授，有四类民族音乐课程，共二十余班。笔者于 2002 年被选为亚洲研究系主任。又因在神学院及教会事奉，常被问及教会音乐敬拜难题，因不懂教会真理常哑口无言以对，终于致力教牧学进修多年。

[2] **Classical Music**, 古典音乐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术语，广义的西洋古典音乐是指那些从西方中世纪开始至今的、在欧洲主流文化背景下创作的音乐，或者指植根于西方传统礼拜式音乐和世俗音乐，其范围涵盖了约公元 9 世纪至今的全部时期。

[3] 流行音乐、流行歌曲（英文：**Popular Music**）泛指易于被大众所接受和喜欢的音乐风格。随着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类型转换，普遍被接受的特点也延伸出许多商机。流行音乐常常有着商业化的运作。和流行音乐形成对比的音乐形式是古典音乐和民族音乐。

[4] 请参考下文中国音乐特色一段。

[5] 甚至可以说是领导人人文主义的思想哲理和理性主义的发展。

[6] “文艺复兴”是欧洲中世纪(12 世纪)早期和中期的一段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剧变，哲学和科学的源头重新被找回的时期。这一段时期为 15 世纪意大利文学和艺术的变化以及 17 世纪的科学革命铺路。

[7] “启蒙时代”（法文：**Siecle des Lumieres**）通常是指在 18 世纪初至 1789 年法国大革命间的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与理性主义等一起 构成一个较长的文化运动时期。这个时期的启蒙运动，覆盖了各个知识领域，如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教育学等等。

[8] “人文主义”是一种基于“理性”和“仁慈”的哲学理论和世界观。作为一种生活哲学，人文主义从仁慈的人性获得启示，并通过理性推理来指导，以理性推理为思想基础，以仁慈博爱为基本价值观。至于个人的兴趣、尊严、思想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容忍和无暴力相处等等，都是应有之义。与中国道家的顺从自然，“无，虚，静”成对比。

[9] “形而下”是“形而上”的反面，“形而上学”是指通过理性的推理和逻辑研究不能直接通过感知所得到的问题。

[10]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哈（德语：**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 年 3 月 21 日—1750 年 7 月 28 日），巴洛克 (**Baroque**) 时期的德国作曲家，杰出的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演奏家。巴哈被普遍认为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并被尊称为“西方‘古典音乐之父’”，也是西方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11] “十二平均律”理论：当音乐只在较狭隘的和声范畴中，音调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若要在八度音程，比如 C 与 C 之间，将十二个半音平均地标准化，就会出现如何律订半音的需要，比如升 C 和降 D 的音高。这是巴洛克时代键盘乐器成为主乐器后，经常讨论的问题，因为键盘乐器需要定音，所以必须要找到限定音程的办法。巴哈的平均律，就是尝试用同一音律系统来应付所有调号的音阶。

[12] Perfect Octave (频率一比二, 例：A2 频率是每秒 110; A3 是每秒 220; A4 是每秒 440)

[13] “浪漫主义”是颠覆“启蒙时代”以来的贵族和专制政治文化，以艺术和文学反抗对于自然的人为理性化。(Romanticism) 是开始于 18 世纪西欧的艺术、文学、和文化运动，大约就发生在 1790 年工业革命开始的前后。它注重以强烈的情感作为美学经验的来源，并且开始强调如不安、惊恐等情绪，以及人在遭遇到大自然的壮丽时表现出的敬畏。

[14] “und ebenso ist es mit dem geheimnisvollen Strome in den Tiefen des menschlichen Gemutes beschaffen, die Sprache zahlt und nennt und beschreibt seine Verwandlungen, in fremden Stoff; die Tonkunst stromt ihn uns selber vor” — W. H. Wackenroder, *Herzensergiessungen eines kunstliebenden Kloster-erbruders*, ed. A Gillies, 148

[15] 传说战国时期，一位叫韩娥的女子来到齐国，因为一路饥饿，断粮已好几日了，于是在齐国临淄城西南门卖唱求食。她美妙而婉转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天以后，人们还听到她的歌声的余音在房梁间缭绕，人们都说韩娥之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16] Gk. Ethnos, as in “Ethnomusicology”

[17] Contextualizing folk music

[18] 心理或社会学家研究结论提出，同化的过程，即从新移民到完全美国化，最少要五代，150 年的时间。

[19] 以市场需求原则来从事神学教育是一错误

[20] 要对这作进一步参考，可读拙“商品音乐，艺术音乐，基督教音乐”-翼报-第 2 期 (2004 年 9 月 (www.eBaoMonthly.com))。

[21] 所有语言里都有多少旋律节拍的内容。

[22] Chinese language is a tonal language, talking is equivalent to singing.

[23] 《史记乐书》中记述：“是故先王之制礼作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意思是说，先王制定礼规创作乐舞，不是为了满足人的眼耳口腹的欲望，而是教化百姓识辨善恶、使人回归到做人的正道上。

[24]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毛诗正义 4 关雎(三); 参考上文: “一、中国语言与音乐的密切关系”最后一段有关诗词与音乐的一致性。

[25] “中，平，和”是中庸之道；“庶”是孔子提倡的“有教无类”普及教育的哲学。

[26] Functional Nature of Chinese Music

[27] “Lift High the Cross”，证主的“恩颂圣歌”283，

[28] “Jesus, What a Friend for Sinners”，福音自传会张宝华篇的“恩颂圣歌”46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十九期，2010年1月。

(笔者为特约作者特为本期撰稿；作者保留版权)